

## 【学界往事】

□ 黄万华

前不久,评审学校的教改项目,看到外国语学院举全院之力创办“梁实秋班”的计划。从“劣迹斑斑的走狗文人”到令人仰慕的文化品牌,恍如隔世,但梁实秋真的为大家所熟知了吗?我就说说鲜为人知的梁实秋吧。

1960年9月的《自由中国》事件曾震动台湾。《自由中国》创办于1949年9月,主持人为国民党资深人士雷震,编辑委员中有台湾教育部长杭立武,学者毛子水、殷海光等,书生论政,批评现实制度,督促政府实行民主自由。尖锐的批评最终不为当局所容,雷震等四人锒铛入狱。《自由中国》被查封后,杂志同仁受连累,当时编委中唯一的女性、负责文艺栏的聂华苓(后来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)也陷入困境,以往一些熟人纷纷避而远之。就在这种被孤立的时候,梁实秋却不时请她去家里做客,“梁师母以拿手好菜款待,梁实秋扮小丑说笑话,惹得她们开怀大笑。”1964年,聂华苓赴美时,梁实秋又主动出借路费。聂华苓并非梁实秋的经年知交,此时梁实秋的举动有患难时刻的友情,更有肝胆相照的支持。聂华苓认同三民主义,但她主编《自由中国》文艺栏10年中,坚持纯文学立场,审阅来稿,“凡是有政治意识、反共八股的,我都是退!退!退!”这种立场,态度显然得到梁实秋的赏识。半个世纪后的2009年8月,台湾召开纪念雷震、殷海光等《自由中国》同仁研讨会,马英九到场致词,肯定《自由中国》的贡献,向当年为自由民主献身的人士家属鞠躬道歉。当年梁实秋不屈从外在政治意识的压力,和《自由中国》一起坚守人文立场、文学立场的行为同样被人怀念。

梁实秋当年因为倡导“人性论”而被鲁迅斥为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”(梁实秋和鲁迅之间的论战长达近10年,两人对垒的文章125篇,50万字以上,但中心问题就是人性与阶级性及文艺政策),抗战期间又

# 鲜为人知的梁实秋

一个人一生坚持一些长久的根本性的东西,实所不易。梁实秋坚持的正是文学长久所在,民族长久所在,而我们起码应该在“什么是长久而根本所在”上多一些常识。

被左翼作家戴上鼓吹“与抗战无关论”的帽子;1940年,梁实秋曾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前线慰劳团,计划去延安,因毛泽东致电不欢迎其前往而作罢。其实,他倡导“人性论”是受惠于哈佛留学时所接触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,白璧德正是以“人性论”作为他全部理论架构的基础,强调人生不可缺少“自然的生活”,也要追求高尚的“宗教的生活”,但最重要的是对“人性的生活”要有“人文的约束性原则”,通过自我反省,内在服从某种高于一般自我的东西,以抵御现代社会道德、情操、行为的规范失效。这成为梁实秋一生为人从文的基本理论,其文学立场,也必然守护文学的独立性,让文学能表现健全的人性。他1931年发表《所谓〈文艺政策〉者》一文,批评鲁迅所翻译的《文艺政策》,这惹怒了左翼阵营,将他视为地道的右翼文人。然而,梁实秋在1942年发表《关于〈文艺政策〉》,对张道藩制定文艺政策同样严厉批评。就个人关系而言,张道藩是朋友,但事关文学,梁实秋就不会被朋友私情所困,更不会向张道藩所有的官方权势背景屈服。

梁实秋是至今唯一独立将莎士比亚全集翻译成中文的人,其目的也是要发挥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价值。他是1930年任教于青岛大学时加入胡适发起的“翻译莎士比亚全集”计划的,之前的1929年,他刚刚与鲁迅就翻译问题发生了论争,虽两人的恩怨由此加重,但争论的意见却是有意义的。鲁迅翻译苏俄理论“硬译”,晦涩难懂,但他也诚挚表示,这只是从“无有”向“较好”的过渡罢了;梁实秋则认为应该以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,为此,不妨将英语句法变换一下。梁实秋之所以拿鲁迅的翻译说话,是因为他觉得鲁迅的创作何其通畅精炼,笔力雄厚,为何翻译却离“死译”不远?鲁迅的“委屈”梁实秋也感觉到了:“梁先生自己不翻译,却批评译者。”所以此后他毕一



梁实秋与夫人韩菁清

生之力,投入莎剧的翻译,实践自己的翻译主张。

1967年,37册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中文译本在台北问世,当时的台湾,西化之风甚盛,《莎士比亚全集》却让人感受到“中国味道”。梁实秋具有极高的西洋文学修养,却将中国传统的为人治学再次展现在人们面前。而随后几年,他的《雅舍小品》在封笔了二十余年后,相继出版了二集、三集、四集,展示出源自中国传统的人生艺术的巨大魅力。梁实秋在此时连续推出“雅舍”系列,似乎是以此提醒日益欧化的台湾文坛、社会。梁实秋在生命的最后岁月(《雅舍四集》)出版于梁实秋去世前一年),用他的“雅舍小品”再次点燃了中华文化传统的薪火。

一个人一生坚持一些长久的根本性的东西,实所不易。梁实秋坚持的正是文学长久所在,民族长久所在,而我们起码应该在“什么是长久而根本所在”上多一些常识。1938年,众口一词批判梁实秋,成为抗战期间第一次政治批判运动。姑且不论梁实秋本

人热心于抗战:在北平时,他在《自由评论》上撰文尖锐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;北平沦陷后,他又因力主抗战而被列名于日本宪兵队的通缉名单;只身出走入川后,他在一些视察抗战前线的文章中,充分流露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心理……就是那段被批判为“抗战无关论”的“编者按”,梁实秋的逻辑也一清二楚:就文学副刊而言,“现在抗战高于一切”,所以,“与抗战有关的材料,我们最为欢迎”,但“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”,“至于空洞的‘抗战入股’,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”。

今天,谈起梁实秋不为人们熟知的这些事,正如余光中所言:“梁实秋当年面对老练泼辣的前辈作家,面对人多势众又有组织的左翼阵营,敢于挺身而出,明确地指陈文学的本身,为缪斯护驾,表现的不仅是智者的眼光,更是勇者的胆识。”历史终究不会淹没智者的眼光、勇者的胆识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书法是在汉字的基础上书写而成的一门艺术,但并非所有认识汉字的人都能认识书法家笔下的文字。有时书法家写的字并不难辨识,即使在这种情况下,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些书法的真正含义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本文只举两个例子:一个是“虫二”;一个是“佳五矢止”。

杭州西湖,湖心亭有一石碑,上有乾隆御书“虫二”二字。泰山万仙楼北侧盘路西侧有一块摩崖刻石,也有清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历下才子刘廷桂题写的“虫二”二字。这两个让人不知所云的字,总是让初见者一头雾水。这个乾隆皇帝和刘廷桂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呢?“虫二”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字背后,又蕴藏着怎样的玄机呢?原来,这个“虫二”分别是“风(繁体字为‘風’)月”二字的中间部分,省去外面的轮廓,寓意“风月无边”,形容绝胜的风景,构思巧妙,耐人寻味。

看来,没有点儿中国传统文化知识,即使看到了自己本来认识的字,仍然有可能不解其义。学英语的人应该都有这样一种体会,一开始总觉得自己词汇量不够大,可越往后学,越觉得材料中的每个单词都认识,但整个句子的意思却还是搞不懂,这就是文化在作怪啊。

据比较可靠的史料,“虫二”最早应是源自书画才子唐寅。清代褚人获《坚瓠集》中收录了明人《葵衍琐记》的一则记载,其中说:“唐伯虎题妓湘英家匾云‘风月无边’,见者皆赞美。祝枝山见之曰:‘此朝汝辈为虫二也。’湘英问其义,枝山曰:‘风月无边,非虫二乎?’湘英终以为美,不之易。”明末清初张岱的《快园道古》中也记载了一则类似的故事,只不过故事的主人公是明代大文学家、书画家徐渭。但唐伯虎长徐渭五十一岁,显然唐伯虎的“虫二”比徐渭早。

## 【书法茶座】

# “虫二”与“佳五矢止”

□ 杨加深

如果说“虫二”有些无迹可求的话,下面要说的钱文书法“佳五矢止”,就相对简单一些。然而,当我第一次在黑板上画出钱的形状并写下这四个字的时候,还是没有有一个学生知道其中的含义。我们且不说用篆书写成的“佳五矢止”四字了,即使用现代人都认识的楷书写出来,又有几人能一下明白其寓意呢?原来,其中的妙处在于圆形方孔花钱的方孔,即“口”状的钱穿上。只有当我们在释读这四个怪怪的字时,同时结合中间的“口”字形钱穿审视,才能正确解读其中的寓意。因为自右向上依次旋读的“佳五矢止”四字,分别加上一个共享的口子,就成了“唯吾知足”。当然,我们也可以换一种释读顺序,即“吾唯知足”。需要指出的是,“唯吾知足”看似俚俗,却是出自与圆音寺横梁上的一只蜘蛛有关的佛教故事。简而言之,这只蜘蛛因常年听佛祖讲经逐渐有了佛性,一心想修成人形。佛祖曾三次问它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,蜘蛛的三次回答分别是得不到的、已失去的和平常之物(即眼前的东西),最后一次它答对啦,于是就有了“唯吾知足”的说法。直到现在,人们佩戴的饰品和挂件中,仍有以蜘蛛作为题材的,就是因为蜘蛛谐音“知足”。

这种最早出现在汉朝的“唯吾知足”钱,微妙之处在于四字共享一个“口”字,故后人又称其为“借口钱”。巧合的是,这四个字也最早出现在最能引发人性贪欲的纸币上,其警世意义相当深刻。它时刻提醒佩戴这种花钱的人要有一颗平常心,要珍视平常之物,毋生贪念。

再回到书法艺术上来,这四个字之所以最早出现在古钱上,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的圆形方孔钱的特殊形状,因为只有以圆形方孔的纸币为载体,才最适合表现这样的妙构。清人戴熙曾经说写书法有三难,而其中最难布局的就是纸币上的书法,他说:“印篆难,榜书难,钱文难。非毫发无遗憾,波澜独老成,不成书道。论章法,印以方,榜以横,钱以圆。三者之中,钱尤难矣。”看来,“唯吾知足”的钱文妙构,古人是花了一番心思的。

中国书法的表现形式是包罗万象的,也是无处不在的。在我们惊诧于其高妙的艺术效果的同时,也应该深入解读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,毕竟,书法是在实用汉字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艺术,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,我们是很难写好书法,也很难读懂书法的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副院长,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)

## 【呼吸之间】

□ 刘亚伟

# 平庸之恶

这种对现实的隔膜,这种无思想性,远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,更能引发灾难和浩劫。

为可能的时候,它也成为不可罚、不可恕的极恶。极恶是无法用自私、纵欲、贪婪、怨毒、嗜权、懦弱这些邪恶动机来解释的,因此,对极恶既不能用恨去复仇,也不能用爱去容忍,或用友情去宽恕。”

等到看见艾希曼的“真身”,她却转而用“平庸的恶”来称呼这种现象。

是什么促使阿伦特做出这种改变呢?

阿伦特在法庭上看到坐在防弹玻璃亭里的艾希曼,并不像传说中天性邪恶,以杀人为乐的那种恶人。相反,他表现得唯唯诺诺、毕恭毕敬、礼貌周全、谈吐清晰,“一点也不粗野”,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,像一位绅士那样。尽管他做了可怕的难以理解的事情,但他本人却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人,这一点给在场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艾希曼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时反复地强调: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,只是起了传动的的作用罢了。严谨、勤奋、努力帮助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。他的特点是精明强干、从不失手,

为了完成一个目标,他会以最大意志,尽最大努力排除一切困难。对强权的统治者来说,这真是一个非常合手的工具。

从1937年起,艾希曼一直被认为是犹太人问题“专家”,他本人并不是通常所说的“反犹主义者”。他是犹太文学、美术的爱好者,熟悉犹太经典。作为德国的一名普通公民,艾希曼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当时的德国法律所允许的;作为一名职业军人,他只是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已,一切都是那么简单。

阿伦特由此改变了她原先对极权邪恶“不可知”的看法。她认识到,邪恶不是一种卑鄙得超乎人的理解限度的现象,邪恶是产生于肤浅动机的反常行为,邪恶因动机的肤浅而平庸。邪恶的动机是平平常常的人性弱点,邪恶的动机人人能懂,并不需要高远深奥的理论解释。艾希曼之所以作恶,并非因为他有以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,或者他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出人头地,相反,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,他一切照章行事,不敢越雷池一步;他把自己

降低为“什么也不是”,只是一个不出声的驯服工具。

阿伦特认为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真正可怕。正是对于政治、道德的欠缺反思和对于上级指令的单纯服从,导致反犹太主义的历史暴行得以获取民众的配合。

阿伦特分析道:“在他的内心深处,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,‘一心想做个恶人’。除了特别勤奋地工作以便获得个人的提升外,他根本没有任何动机。就这种勤奋本身来说,并不能说是犯罪;他永远不可能谋杀上可以继承其职位。说白了,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……他并不愚蠢。他只不过是没有任何思想罢了——但这绝不等于愚蠢——惟其如此,他才变成了那个时期最大的罪犯之一……这种对现实的隔膜,这种无思想性,远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,更能引发灾难和浩劫——事实上,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获得的教训。”

(本文作者为自由作家、独立学者)